



中国历史小丛书

司马光和《资治通鉴》

冯惠民

中华书局



K204.3/4

中国历史小丛书

司马光和《资治通鉴》

冯惠民

中华书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1/32·2印张·31

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15,500册

统一书号：11018·998 定价：0.16元

K204.3/4

中国历史小丛书

司马光和《资治通鉴》

冯惠民

目 录

- 一、勤奋好学的司马光..... 3
- 二、司马光以前的编年体和纪传体..... 6
- 三、《通鉴》的始编和名称的由来.....10
- 四、书局的成立和分工.....14
- 五、《通鉴》的编写程序.....20
- 六、《通鉴》的完成.....23
- 七、《通鉴》的历史价值.....28
- 八、《通鉴》的缺点和局限.....45
- 《通鉴》的“注”和严衍的“补”.....51
- 《通鉴》的派生书.....58

司马光字君实，宋陕州夏县（今山西夏县）涑〔sù 速〕水乡人，故称“涑水先生”。他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和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。

司马光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。他的父亲司马池，历仕宋真宗（998—1022年在位）、宋仁宗（1023—1063年在位）两朝，官至天章阁待制、三司副使^①。人称“天章公”，为一时名臣。宋真宗天禧三年（1019年），司马池在光州光山县（今河南光山）任县令时，司马光生于光山县官舍。这就是他取名司马光的由来。

仁宗景祐五年（1038年），司马光二十岁，中进士甲科。不久，父母先后亡故，他服丧数年；服除以后，便到京师汴京（今河南开封）去做官。宋仁宗末年，官至天章阁待制兼侍讲。宋英宗（1064—1067年在位）时为龙图阁直学士^②。宋神宗（1068—1085年在位）即

① 天章阁是宋真宗晚年在宫中建立的藏书阁。宋仁宗时专藏真宗遗墨，并设置待制官，担任皇帝顾问。三司（盐铁、户部、度支）副使是掌管钱谷出纳和财政收支的高级副官。

② 龙图阁是宋真宗时修建的藏书阁，收藏宋太宗（977—997年在位）御书、文集、典籍、图画等。设有学士、直学士等官，是皇帝侍从的荣衔。

位后，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、御史中丞^①等职。王安石(1021—1086年)变法时，他极力反对，受到排挤，于是退居洛阳，专心编写《资治通鉴》。宋哲宗(1086—1100年在位)即位后，高太后听政，司马光应召入京，主持政事^②，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(宰相)。他在短短的几个月里，就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止。哲宗元祐元年(1086年)九月，司马光病死，卒年六十八岁，被追赠为“温国公”，谥号“文正”，所以后代学者称之为“司马温公”或“司马文正公”。

司马光的著作很多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的就有数十种。清朝乾隆年间(1736—1795年)编撰的《四库全书》^②，收入的也有十余种，主要有《资治通鉴》二百九十四卷，《资治通鉴目录》三十卷，《资治通鉴考异》三十卷，共三百五十四卷。此外还有《司马温公传家集》(简称《传家集》)八十卷，《稽古录》二十卷，以及《涑水纪闻》等。其中《资治通鉴》最负盛名。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(1722—1797年)等人称它为“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，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”。这是很有道理的。

① 翰林学士是皇帝的亲近顾问和秘书官，负责草拟皇帝的诏书和文告。御史中丞是中央监察机关的高级官员。

② 《四库全书》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共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，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。乾隆三十七年(1772年)开馆纂修，十年后完成。是一套内容广泛、规模浩大的丛书。

司马光之所以能够完成《资治通鉴》，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，这跟他自幼脚踏实地、刻苦读书是分不开的。

一、勤奋好学的司马光

司马池对司马光从小就管教很严。有一次，司马光要吃青核桃，他姐姐给他剥皮，怎么也剥不掉。有个女佣人心灵手巧，用开水烫了一会儿就剥开了。后来姐姐问他是谁剥开的，司马光说是自己剥的。这话被司马池听到了，便狠狠地训斥他，说：“小孩子怎么能撒谎！”从此以后，司马光再也不说假话。当时，司马光只有六岁。

也是在六岁的时候，司马光在父兄的督促、教育下，开始读书、写字。七岁时，他就去听人家讲《左传》，觉得津津有味；回家后，还学着给家里人讲。据说，当时他对《左传》的大意，已经有所了解。

从那以后，他读书的兴致越来越浓，经常是手不释卷。

司马光懂得时间的宝贵。为了抓紧时间读书，他用一截圆木当枕头，称为“警枕”。每天夜里，“警枕”一滚动，他就立即起床，伏案读书。久而久之，便养成了

刻苦读书的良好习惯。

司马光聪明机智，肯动脑筋，很会思考问题。有一次，他跟几个小孩儿在花园里玩耍，一个小孩儿不小心掉到水缸里，情况十分危急。其他几个小孩不知该怎么办好，吓得纷纷走散。只有司马光十分冷静，他不慌不忙地拣起一块石头，使劲儿把水缸打破。水从洞里流出，掉在缸里的小孩儿也得救了。据说，这个故事曾被画成图画，在汴京、洛阳一带广为流传。

古人读书往往强调背诵，有“朝诵之，夕思之”的说法。司马光十几岁的时候，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。当时跟他一块儿读书的叔伯兄弟，一旦会背了，就都丢下书本出去玩耍。司马光却独自留下来，继续读下去，直到背得滚瓜烂熟，弄通弄懂才肯罢休。他觉得，只有多下功夫，多用力气，才能真正把知识学到手，做到终生不忘。平时，不论是白天骑马走路，还是夜里睡不着时，他都不肯让时间白白跑掉，不是抓紧背诵，就是认真思考问题。所以，他很早就表现出一定的才华。据宋代大文学家苏轼（1037—1101年）说，司马光在十五岁的时候，已经很有学问；他写的文章，古朴、淳厚，有西汉风格。

司马光是富贵人家子弟，从小却养成了俭朴的品质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他以节俭朴素为荣，以华靡奢侈

为耻，在饮食、衣着等方面，从不过分追求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那就是“视财利纷华，如恶恶臭”。到晚年，他专就这个问题给儿子司马康写过一封信。信中说，穿衣不过是为了御寒，吃饭不过是为了充腹。许多人因此嘲笑他，说他太简陋；他毫不介意。他举出许多靠俭朴而成就大业、名扬后世，和因追求奢侈而一事无成，甚至身败名裂的具体事例，来说明“以俭立名，以侈自败”的道理，谆谆告诫司马康。

另一方面，司马光对待书籍却珍爱备至，视为无价之宝，翻阅时小心谨慎，遇到好天气，还拿出去凉晒。所以即使翻读了几十年，仍然象新书一样。他对儿子说：“商贾收藏的是金钱货币，我们儒生，只不过有些书籍而已。”后来，当司马光病死的时候，室内陈设萧然，图书盈几。在枕边还放着一本刚刚读过的书籍。

当然，司马光生活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封建社会里，他又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，所以，对他的节俭也要作具体分析。司马光退居洛阳以后，曾买田二十亩，修建了一座独乐园。里面有读书堂、弄水轩、钓鱼菴、种竹斋、采药圃、浇花亭、见山台等，景致秀丽。举目见青山，俯视有流水。在宋代洛阳名园中，它以小巧玲珑、幽静淡雅著称。由此可见，司马光虽然比同一时代、同一阶级的许多人要俭朴些，但是，跟挣扎在死

亡线上的千百万劳动人民相比，又有天壤之别。何况，对司马光的记载，史书中又往往有夸大的成分。

不过，司马光生活节俭，不事铺张的可贵品质以及刻苦读书、善于思考的学习精神，在古代著名学者中是比较突出的一个。以后，司马光立志编写《资治通鉴》，并在史学上做出伟大贡献，跟他的可贵品质和学习精神是分不开的。

二、司马光以前的编年体和纪传体

我国历史悠久，文化发达；汉唐以后，图书渐多。仅就史书而言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已经把史部分为正史、古史、杂史等十三类，著录八百一十七部，凡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。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，著录的史书都续有增加。就史书的体裁而言，宋以前的正规史书主要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。

一般认为，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是《左传》^①。

相传孔子（前 551—前 479 年）曾整理、修订过鲁国的史书《春秋》。由于《春秋》叙事过于简略，每条少

^① 西晋太康年间（280—289 年）在河南汲县魏王墓里发现的《竹书纪年》，也是最早的编年体史书，不过宋时已经亡佚。清代王国维的《古本竹书纪年辑校》可资参考。

的只有一两个字，多的也不过二十余字，所以左丘明等又根据当时各国的史料，作了增补、充实和解释，并跟《春秋》的部分条目编在一起，称为《左传》。以后又叫《左氏春秋》或《春秋左氏传》。

《左传》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(前722年)，实际终于鲁悼公十四年(前454年)。它以时间为纲，按照年月次序叙述了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。这种年经事纬的史书体裁，被称为编年体。由于编年体以事系日、以日系月、以月系时、以时系年，把同一时间发生的各种事件编排在一起，所以脉络清楚，一目了然，容易看出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。同时，它对一国一族的兴衰治乱的缘由和经过，叙述也比较详尽。据说春秋各国都有过各自的编年史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。

不过，编年体也有它的缺点和局限，如对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典章制度，叙述就比较简略。所以，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（约前145—前90年），又创立了纪传体。

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包括“本纪”十二篇，“世家”三十篇，“列传”七十篇，“表”十篇，“书”八篇，凡一百三十篇。其中“本纪”专载帝王事迹，“世家”讲王侯封国历史，“列传”主要是各类名人或少数民族的传记。这种以人物传记为主的史书体裁，被称为纪传体。

东汉时,班固(32—92年)的《汉书》,门目上虽有所改易^①,但是,《史记》开创的基本体例却被继承下来,以后各史也因循不改。到司马光时,“十七史”^②以及后晋刘昫〔xù 叙〕的《旧唐书》和薛居正的《旧五代史》,共十九部纪传体史书,都已先后问世。这就是封建史学家所说的“正史”,即正统史书。

纪传体既以人物为中心,查找历代名人的生平事迹就比较方便;对各种典章制度也有专篇记述。这是它长于编年体的地方。同时,纪传体史书,前后相续,代有其作,保存了上自黄帝,下迄五代,约三千多年的丰富史料,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。

不过纪传体史书大都是包举一代的断代史,只有《史记》是贯古通今的通史;每一部史书,又都是卷帙浩繁,动辄数十万言。同时,纪传体本身也有它的缺点和局限。它在编排上往往以类相从,不大讲究时间的先后,《史记》把屈原和贾谊合为一传就是一个例子。同一个事件,往往这里讲了,那里又讲,头绪纷杂;同一个

① 《汉书》把“本纪”省称为“纪”,把“书”改称为“志”,取消了“世家”。

② “十七史”之名,始见于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。指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班固的《汉书》,范曄的《后汉书》,陈寿的《三国志》,房玄龄的《晋书》,沈约的《宋书》,萧子显的《南齐书》,姚思廉的《梁书》和《陈书》,魏收的《魏书》,李百药的《北齐书》,令狐德棻的《周书》,魏征的《隋书》,李延寿的《南史》和《北史》,宋祁、欧阳修的《新唐书》,欧阳修的《新五代史》。

内容,前后屡出,重复很多。对许多事件的历史背景和发生的具体年代,有的记载简略,有的则缺而不书。这些问题,前人已多有批评。

所以,早在东汉末年,汉献帝(189—220年在位)就嫌《汉书》文繁难省〔xǐng 醒〕,让史学家荀悦(148—209年)仿照《左传》的体例,把长达八十万字的《汉书》,改编成只有八万多字的《汉纪》。《汉纪》的史料几乎完全取自《汉书》,但它文辞简洁,叙事详尽,剪裁得体,又稍有增益,如对西汉末年河北铜马农民起义的记载,就比《汉书》详细。《汉纪》又不同于《左传》。《左传》是解释《春秋》、附属于《春秋》的;《汉纪》则是自著一书,独立成篇,从而开创了新的编年体。所以受到汉唐学者的重视。

唐代史学家刘知几(661—721年)说,历代学者都很推崇《汉纪》,认为它超过了纪传体。他指出,班(固)、荀(悦)二体,角力争先,想废掉那一个都是难以做到的。所以以后的作者,超不出这两种体例。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。到魏晋南北朝时,专记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就有九家^①,还不包括范曄(396—446年)

^① 指东汉刘珍的《东观汉记》,吴谢承、晋华峤、晋谢沈、晋袁山松以及刘宋刘义庆五家的《后汉书》,晋张莹的《后汉南记》,晋薛莹的《后汉记》,晋司马彪的《续汉书》。均已亡佚,少数尚有后人辑本。

的《后汉书》；编年体史书则有晋张璠和袁宏(328—376年)先后写成的两家《后汉纪》。不过流传到今天的,只有范曄的《后汉书》和袁宏的《后汉纪》。有关其它朝代的史书,情况也大致如此。

由于编年体和纪传体各有优劣,所以汉代以来,它们相辅相成,并行于世。不过,封建统治者对编年体重视不够,所以,编年体史书往往时有时无,没有象纪传体那样形成一套前后衔接的系统史书,就是已经问世的也往往散失。同时,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,几乎都是断代史。象《史记》这样囊括古今,包罗万象的通史规模,却长期无人继承。

到了宋代,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繁荣,人们更迫切需要了解历史、研究历史;同时,经过长期战乱,宋代统治阶级也想总结历代政治得失,作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借鉴。所以,单靠浩繁难读的纪传体断代史书,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,而编写一部简明扼要、贯古通今的编年体通史,便提上了日程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,才产生了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。

三、《通鉴》的始编和名称的由来

青年时代的司马光,笃好史学,对历史特别用心,

同时又深深体会到读书的困难。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之一是活字印刷术发明以前，图书流传不广，许多史籍在民间很难找到。司马光在写给刘恕的一封信中说，他小时候，读了一本唐朝高峻写的《高氏小史》就觉得很不错了。不仅他自己如获至宝，而且还把它推荐给别人。其实《高氏小史》是根据《史记》至《隋书》等纪传体史书抄纂而成的，并不是有名的著作。至于从南朝刘宋到隋这一时期的“正史”，有的他根本没有读过，有的他虽说读过，却并不熟悉；直到以后编写《通鉴》时，他才有机会去细读这些纪传体史书，并认为唐李延寿的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，叙事简洁，没有烦冗芜秽之辞，是近世之“佳史”。

苏轼比司马光小十八岁。他在《李氏山房藏书记》中这样写道：我曾经听老先生们说，他们小时候，想找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都很困难；幸而找到了，还要逐字逐句地亲自抄写，然后才能去读。这大体上反映了司马光年轻时读书难的情况。

宋仁宗庆历(1041—1048年)年间，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，这正是司马光二十多岁的时候。此后，宋仁宗便下令校定、摹印“正史”。不过活字印刷术的普及、推广以及书籍的广泛流传，要有一个过程。所以，司马光在同一封信里还感叹地说，天下人家能有几本？古

人读书之难，由此可以想见。

读书困难的另一个原因，是纪传体史书的卷帙浩繁。仅就“十七史”而言，就有一千五百卷，全部读完要花好几年的时间。所以，一般读书人，很少能从头至尾通读一遍，更谈不上精通它了。加上纪传体史书本身体例上的局限，使用起来也不很方便。所以，司马光说，这些史书文繁事广，读者往往不能得其要领。

阅读史书虽然困难，但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，又至关重要。司马光认为，“史者今之所以知古，后之所以知先，是故人君不可以不观史”。因为史书记载着古今兴衰治乱的原因，皇帝不能不知道。鉴于皇帝无暇阅读文字繁多的各纪传体史书，又必须遍知前世得失，于是他决定“上自战国，下至五代，‘正史’之外，旁采他书，凡关国家之盛衰，系生民之休戚，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，帝王所宜知者，略依《左氏春秋》体，为编年一书”。

这就是说，司马光立意写编年史的原因是嫌纪传体烦冗难读，欣赏编年体的简明扼要；他编写的目的是，让皇帝观古知今，以史为镜，从历代兴衰治乱中鉴戒得失，总结经验教训，巩固封建统治。史学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从来就离不开政治；封建史学家也把史书的编纂视为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重要手段之一。对于这一点，司马光是了解得很清楚的。

司马光计划写编年史，并对这部史书的基本轮廓酝酿成熟，大约在宋仁宗嘉祐（1056—1063年）年间。当时正是他三十八岁到四十五岁的时候。到英宗治平元年（1064年），司马光写成《历年图》^①，进呈给宋英宗。它按年代顺序，谱列每年大事。每年一行，六十行为一重，五重为一卷，共五卷。在起迄时间和具体体例上与以后的《通鉴》大致相同。这说明《历年图》是《通鉴》的雏型或提纲。

两年以后，司马光又完成了《周纪》五卷、《秦纪》三卷，并取名《通志》，于治平三年（1066年）进呈给宋英宗。《通志》八卷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前403年）韩、赵、魏三家被封为诸侯写起，到秦二世三年（前207年）秦朝灭亡为止，叙述了战国七雄的兴亡事迹。这是司马光独立撰写编年体通史的开始，《通志》就是《通鉴》的前身。

由于《通志》的编写意图，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，在学术上也有突出的成就，所以宋英宗对《通志》八卷十分欣赏，认为它胜过了荀悦的《汉纪》，是前所未有的著作。但是，他不同意《通志》这个名称，只说让司马

^① 到哲宗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，司马光又以《历年图》为基础，补续成《稽古录》。这是上起伏羲下至英宗治平四年（1067年）的编年体大事记。《历年图》就保存在《稽古录》中。

光“编修历代君臣事迹”，续成八卷以下的未竟之篇，等书成以后再取旨赐名。由于这一工作繁难浩大，一个人难以胜任，宋英宗又答应了司马光的请求，同意设立书局，并让司马光推荐人才。这样，在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和赞助下，这部编年体史书又进入了集体编修的新阶段。

第二年，即英宗治平四年(1067年)正月，英宗去世，神宗即位。不久，宋神宗正式把这部书命名为《资治通鉴》，并亲自预写了一篇序言，表示赞助。宋神宗不仅重视史书的编修，而且认为“为史但当实录，以示后世”。他对史书的繁冗也很不满意。这跟司马光的看法不谋而合。所以，宋神宗的支持，保证了《通鉴》的顺利完成。

四、书局的成立和分工

宋英宗治平三年(1066年)四月书局成立时，司马光推荐了刘恕和赵君锡。赵君锡因父亲去世不能参加，改由刘攽(bān 般)代替。这样，刘攽和刘恕便成为书局前期的两个助手。

刘攽(1023—1089年)，字贡父，号公非，临江新喻(今江西新余)人。宋仁宗庆历六年(1046年)进士。